

# 《人民的名义》中的女性“他者”形象

孔庆荣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外语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摘要:**在男性视角下,《人民的名义》中的女性形象特征是依附性的。女性在剧中的情场、商场和官场的行动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女性依附于男性的主权地位而存在,是男性作奸犯科的诱因,本身充满了不稳定的自我意识。相对于男性主体地位而言,剧中的女性依旧是男性主权话语体系中的“他者”,是被边缘化和客体化的对象。

**关键词:**人民的名义;男性视角;女性形象;他者

**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8)01-0063-04

自2017年《人民的名义》首映以来,其以反腐为核心的主题,鲜明的人物性格及情节张力,引发了受众的持续热议。作品以反腐为叙事动力,以揭露腐败、匡扶正义、寻求真相为叙事主线,将正义与犯罪、善良与邪恶、真诚与虚伪的矛盾冲突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建构了高层官员日常活动的官场、情场和商场这三种不同的叙事空间,集中展现了权利、地位、金钱世界中女性的生存状态。这些女性拥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伦理观和价值观取向各异,选择的人生道路也各自不同。在男性视角下,剧中的女性形象客观上呈现出“他者”的历时性特点,折射出现代社会中女性的身份特征。

“他者”是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一个关键词,描述了二元对立状态下的一种相互依存关系,有着深厚的哲学渊源。古希腊时,柏拉图就曾经用“男人和女人,自由人和奴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怎样的身份,该说怎样话”<sup>[1](P16)</sup>来阐释这种对立统一关系。黑格尔曾经用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来解析“他者”的内涵:“对于主人而言,奴隶就是‘他者’,‘他者’的存在确立了主体的意识,主体的权威得以确立,他者的显现对构成‘自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sup>[2](P127-128)</sup>萨特认为,他人意识的出现导致自我意识的显现,“他人”是自我的先决条件。他们都强调了“他者”对于主体以及自我意识形成的重要的本体意义,是发生

学维度上的哲学观念。在后殖民主义话语体系里,“他者”是与文明、主流、正宗以及自我等概念相对立的。如果对这一概念内涵的外延加以扩展,这便意味着,所谓“他者”,其实就是弱势一方相对于强势一方的对照性存在。换言之,这种状态反映了占主流地位的话语体系对于非主流地位话语体系的一种操控和影响,“它暗示了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的状况”<sup>[3]</sup>。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就是“他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平衡理论,就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两性关系逐渐被定位为充实与亏空、力量与温柔、主动与被动、理性与感性、光明与黑暗、逻辑与混乱等二元对立关系”<sup>[3]</sup>。严格意义上说,“他者”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存在状态,有了“他者”才有了所谓的主流、主体性等概念的实际意义,而这种对立正是“他者”理论的逻辑支点。在《人民的名义》中,女性的角色特点是在男性视野中呈现出来的。相对于男性的强势和主体地位而言,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婚姻中,女性始终是弱势和带有依附性的。她们物质层面的不独立,与其精神层面的依附性是一致的。本文即以“他者”理论为依托,将《人民的名义》中的女性角色置于男性话语体系中予以适度剖析,以探讨她们在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地位,分析当前电影叙事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而对当代社会女性权利的主张提出自己的见解。

收稿日期:2017-10-22

基金项目: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计划项目(J16WC03)

作者简介:孔庆荣(1973-),女,山东日照人,教授,主要从事叙事学、文体学研究。

## 一、女性“他者”的存在形式

《人民的名义》的叙事主题集中关注权力、财富以及美色交织下的社会百态,聚焦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角色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在这样的背景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走捷径的底层人物以及大龄剩女,便是《人民的名义》中男性视角下所呈现出来的女性形象。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剧中的欧阳菁、梁璐和吴慧芳,虽然一位是国有银行的行长,一位是高校老师,一位是大学里研究明史的专家,但这些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高官家属。欧阳菁是市委书记的妻子,她的升迁离不开市委书记夫人这一光环。梁璐既是省公安厅长的妻子,又是高干家庭出身的大小姐,父亲曾经是高级官员。吴慧芳是省政法委书记的妻子,一个令人尊重的高级知识分子。丈夫的仕途名声为她的身份增色不少,而她也乐于享受这种身份给她带来的种种益处。这三个人,都不幸遭遇了不同形式的婚姻危机。面对婚姻中的背叛和伤害,她们又都毫不例外地选择了姑息纵容,委曲求全。因此,在以侯亮平为代表的男性看来,这些无法摆脱男性权势而独立存在的女性,是当之无愧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走捷径的底层人物。对剧中主要人物高小琴而言,女性这一性别和贫苦渔民的底层出身身份,使她成了“他者”中的“他者”,因此,她具有双重“他者”身份。她身上的标签很多,人性的复杂在她身上得以很好地体现出来。她是受害者。她聪明美丽却出身贫寒。在走出农村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她被纨绔子弟和不法奸商多次性侵,心理被扭曲。于是,她渴望肉体纯洁和追求未来的梦想一起泯灭了。她一直生活在灰色地带。曾经的伤害让她内心深处充满了自卑,她想向善但是不相信自己还有恋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与此同时,她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害人者。她以山水集团为基地,与祁同伟、赵瑞龙沆瀣一气,作奸犯科,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甚至助纣为虐,非法攫取与自己曾经同样是社会底层的民众的股权利益。幸运的是,她收获了祁同伟的爱情,这是她灰暗人生中的一丝光亮。她与祁同伟的爱是真诚的。同样的出身,让他们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彼此依靠,相互取暖。正因为如此,即便在落网之后,高小琴依旧全力维护祁同伟。高小琴的成功和失败,充分折射出出身底层,依靠走捷径获取成功的这类人物的灰色人生。

婚姻市场上的大龄剩女。“剩”字本身就有被选择被审视的意思,隐喻了女性被男性歧视和客体化的被动地位。剧中的陆亦可是一个自立自强的现代职业女性。她是典型的工作狂,一腔热血,满怀正义,热爱反贪工作,一心维护司法公平和社会正义。她不媚俗,不从众,坚守自己的爱情原则。这样一个优秀女性,却因为不够温柔浪漫,不符合男性的择偶标准,成了不折不扣的大龄剩女。近年来网络词汇大行其道,成功的女性往往被贴上“女汉子”“剩女”“男人婆”这样的标签。这种词汇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是男性强权特征下人们对“软弱、温柔、依附”这些女性特质的期待。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与社会发展,挑战一些行业、职业所谓的性别禁区。当一些优秀的女性脱颖而出时,她们所面临的舆情环境常常并不友好。这也间接说明了男权社会对成功女性的排斥和抵制。“他者是危险的,并构成了一种威胁。”<sup>[4](P37)</sup> 当一个社会固有的模式受到来自“他者”的冲击时,为捍卫原有的秩序,社会必然会将“他者”边缘化和客体化,因此,社会对女性的歧视随处可见。很显然,在当前语境下,女性要想取得与男性一样的成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比男性多得多。

以男性视角塑造剧中的女性形象,剧中的女性形象便呈现出了上述不同的类型,而要分析这些不同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的女性在特定叙事空间里的不同表现,便需要对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成因,予以相应的解读。

## 二、女性“他者”成因解析

《人民的名义》中的女性的存在感并不强,很多时候,她们更像是男性身边的影子,是为了衬托男性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势的。剧中女性“他者”地位的形成,既与女性自我对男性的依附有关,更与集体无意识下的红颜祸水观、女性对“他者”双重身份的认知、女性历时性身份特征的传承有关。

女性自我对男性的依附。这部剧所塑造的并不是自立自强的现代女性形象,而是自我依附于女性的女性形象。高小琴来自社会底层,自始至终都在寻找向上流动的通道。在男权话语体系下,没有任何资源背景的她要想获取成功,所依托的只有自己出众的容貌、聪明与隐忍的性格。“没有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的女性只有通过依附男性,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sup>[5](P139)</sup> 高小琴前期所谓的成功,实际上隐喻了这个社会的阴暗面

和不正常的政治生态。吴慧芳们虽然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在遭遇背叛和伤害的时候,却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维持现状,延续形式上的婚姻(欧阳菁和李达康的离婚,是反腐情势所迫,并非本人真实意愿),以便继续享受高级官员家属身份给她们带来的光环和特权。如果说高小琴这类人对男性的依附尚有情可原的话,那么,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欧阳菁、梁璐和吴慧芳这些人,也选择依附在男权之上而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这就令人不得不思考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一个我们必须认可的现实是,这些女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了男性的权力。欧阳菁如果不是市委书记的妻子,成为银行行长的概率恐怕不会很高。梁璐如果失去了公安厅厅长夫人这个头衔,她从小到大的优越感将不复存在。同样,吴慧芳没有了省政法委书记夫人的身份,离婚后的她肯定不能继续住在象征着权力的省委大院里,而她在自己的单位会遭遇什么也可以想象得到。这种依附性根源,就在于她们经济和社会上的不独立。这就势必使她们成为婚姻中的弱势群体,并由此成为实实在在的“他者”。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即便祁同伟已经跟高小琴婚外生子,即使高育良已经和高小凤隐婚,梁璐和吴慧芳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自尊而委曲求全,因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标签,那就是女性,也是“他者”。

集体无意识下的红颜祸水观。《人民的名义》反腐剧情尺度较大,很多素材据说都源于真实案例,整个故事围绕反腐这条主线,让美色和权利裹挟其中,以推动故事情节一步步向纵深发展。在该剧中,高育良从一个满腔热情的大学法学教授升迁为政府高官,再一步步沦为阶下囚,在这一过程中,高小凤对其人生轨迹的影响不可忽视;而祁同伟从一个人人敬仰的缉毒英雄到公安厅厅长,再到畏罪自杀的逃犯,在这一过程中,高小琴的推手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上,祁同伟、高育良等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政治立场不够坚定,信仰缺失,道德沦丧,最终没有守住拒腐防变的底线,抵制不住美色、权力和财富的诱惑。归根到底,这种堕落还是个人的主观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时下的社会语境和文学批评动辄将高官的腐败与女性密切联系起来,而没有挖掘其深层次成因,这是极不客观的。剧中的红颜祸水观,其实是女性“他者”身份的一种隐性体现,是红颜祸水历史观的远距离投射,展现的是文学作品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东周灭亡,却归咎于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吴三

桂投降大清领清兵入山海关,则被文人演绎为“冲冠一怒为红颜”。不少学者也往往将封建王朝更迭和礼乐崩坏的原因归咎于美丽的女性。无独有偶,西方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也随处可见,《圣经》里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就充分说明了西方神话对女性的厌恶和排斥。但红颜祸水观也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女性是可以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控制男性的。这也充分说明,“他者”是可以影响和控制主体的,“他者”与主体之间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实现转化,“他者”与“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效应。这似乎隐含了女性试图藉此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的一种下意识的尝试和努力,虽然这是以一种消极方式而存在的。

女性对“他者”双重身份的认知。剧中的女性其实一直都在试图摆脱自己“他者”的身份地位。她们不断地与现实做各种抗争以自我救赎,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意识,尽管其“双重意识中常常会产生不稳定的自我意识”<sup>[6](P468)</sup>。例如高小琴,一方面,她痛恨权贵,更痛恨给自己带来伤害的不法奸商和纨绔子弟,但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与其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一方面她积极向上,拼命奋斗,希望藉此改变自身和家庭现状,但另一方面,她对社会人生的认知却产生了偏差,极度缺乏安全感。吴慧芳和梁璐这类女性,一方面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着睿智的头脑和体面的身份,珍惜自己的地位和尊严;另一方面,她们却又在婚姻的名义下接受丈夫的背叛,甚至违心与其扮演恩爱夫妻,自欺欺人地维持所谓的面子。她们有过抗争,也试图改变这种现状,例如吴慧芳,虽然内心充满了羞辱和愤怒,但是为了不使女儿受到伤害,为了能维持表面的尊严和地位,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自欺欺人,甚至为高育良的仕途发展出谋划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不管是高小琴还是吴慧芳,她们虽然身处“他者”地位,但都曾努力摆脱或者改变她们的“他者”身份,只不过在尝试之后,最终都以妥协或者失败而告终。在城市化大潮中,相对于各种资源高度集中的城市而言,农村无疑是“他者”。相对于生活在城市,具有原始积累的城市人来说,那些离开原生土地来到城市打拼的农村人无疑是“他者”。那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女性”,更是“他者”中的“他者”。“这种身处两种文化之间无所适从的感觉,夹缝中求生存的心理困境,不仅产生于个人的心理失调,也产生于文化移位造成的心理创伤。”<sup>[6](P468)</sup>可以说,这部剧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所揭示的客观现实,以及由此所带有的普遍的社会学意义。



女性历时性身份特征的传承。在中国几千年的父权制社会里,女性被桎梏在家庭里面,向外发展的通道被阻断,相夫教子成为女性的天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当遭遇婚姻危机时,女性关注的重点,便往往是下一代的感受和形式上的家庭团圆。因此,很多女性为了不伤害家庭成员,更多地选择了委曲求全以维持家庭的表面和谐,而很少主张自我权利。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吴慧芳面对丈夫的背叛和离婚的现实,却选择对女儿隐瞒自己的离婚事实,尽力维持一个家庭形式上的完整。这反映的其实是女性身份的历时性特征。可喜的是,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职业女性,在主流话语体系里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当然,如何主张女性的自我权利,进而使其摆脱“他者”身份,这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社会问题。

“在‘他者’视角的观照下,女性主义者洞见了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形象在影像文化中的‘他者’本质。”<sup>[7]</sup>由此观之,这部剧所呈现出的女性形象,缺失了真正的现代女性特质。不管是卑微的高小琴,还是优越感十足的梁璐们,她们共同的特点都是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一开始就不平等的依附关系,终结了人性的尊严和婚姻的神圣,因而她们最终迷失在名利和现实之中,沦为男性眼里的“他者”。无论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性迷失,还是身份认同的危机,都显示了女性在这个社会文化语境中被弱化和被边缘化的客观现实。本文认为,这部剧的剧情设置和人物描述的立足点,正是当前社会中女性的“他者”

地位。其实,相对于处于权力中心、社会话语中心以及家庭主导地位的男性来说,女性身上所谓被诟病的利己主义特点和依附妥协性,实际上折射出的是“他者”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本文以“他者”理论为依托,从男性视角出发,阐释了《人民的名义》中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关系。在“他者”理论视野下,这部作品的女性形象,无一例外地都指向“他者”形象。这充分说明了,现代女性实现真正独立的道路依旧任重而道远。本文的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丰富电影叙事作品的批评理论与创作实践,对于女性权利的主张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1]柏拉图.文艺对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 [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3]张剑.他者[J].外国文学,2011(1).
-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 [5]祝朝伟.当代西方文论与翻译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6](美)罗伊丝·泰森.当代批评理论使用指南[M].赵国新,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 [7]章旭清.“他者”与“解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关键词解读[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1).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 On the Image of Female “the Other” of In the Name of People

Kong Qingr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s  
Vocational College, Rizhao Shandong, 276826)

**Abstract:** Under the masculine perspecti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 image of In the Name of People is adherent. Women's behaviors in the realm of love, business and politics all convey such information: women are living under the predominance of men, and they are the inducement of men's sins and full of unstable self-consciousness. Contrary to men's predominant status, women are still “the other” in masculine speech system and the subjects of marginalization and objectification.

**Key words:** In the Name of People; masculine perspective; female image; “the other”